

軍事擴散理論的新思維： 複合邏輯下的安全備戰模型

徐子軒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新現實主義針對外部平衡提出了許多的模型，但卻未能說明國家為何，以及如何在不同類型的內部平衡間進行選擇，以回應外在的壓力。要解釋一國在軍事政策上的變化，必須以一種結合體系與單元雙層次變數的理論進行分析，而這種理論的基礎即是目前方興未艾的新古典現實主義。不過，新古典現實主義雖注意到了單元層次的重要性，卻仍忽略了國家行為邏輯的雙重性，亦即，國家除了權衡利害關係（後果性邏輯）以做出決策外，在此過程中，也會受到文化因素（適當性邏輯）的影響。本研究即是希望能夠透過理論綜合的途徑，拓展現有的軍事擴散理論，將國內政策過程的分析含跨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及文化主義），設計出新一代的安全備戰模型。

關鍵詞：軍事擴散、安全備戰模型、新古典現實主義、社會化、理論綜合

* * *

壹、前言

傳統現實主義對於權力平衡發展了許多的理論，大多集中於外部平衡的模型上，儘管現實主義學者 Kenneth Waltz 曾強調內部平衡的準確度勝於外部平衡，但在其系統理論研究綱領的限制下，內部平衡的模型並未受到其他現實主義者的重視，一直要到新古典現實主義漸漸成形後，國際與國家雙分析層次的研究才又回到主流。此外，傳統現實主義者也常關注於戰爭的起源，這是權力政治的一個重要面向，也是和平演變的關鍵問題，如何避免戰爭則是現實主義者的主要關懷。時至今日，各國建軍備戰雖不見和緩，但在現有國際建制規範與核子嚇阻下，強權之間的戰爭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只著重於探討大戰的模型已不敷研究的需求，現在更需要的是針對國家政策產出

的合理預測，準此，本文即是希望設計出能夠盱衡內部平衡的新一代軍事擴散理論—安全備戰模型（Secure-Arming Model）。^①

須注意的是，近來學界在軍事理論的研究上，多偏重於軍事現代化（military modernization）、國防轉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與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等概念，此三者之內涵上或有重疊，亦具有邏輯上的共通性，但三者之間雖有指涉內容的差異，卻只是在程度上的區隔，因此本文並不擬對這些概念進行分類，而是希望以一個概括性的思維統攝這些概念，此一思維即是所謂的軍事擴散（military diffusion），亦即，此三者均可視為是軍事擴散下的分支。由此出發，在第二部分，本文將針對軍事擴散的內涵進行分析，並評介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優點與缺失；在第三部分，本文將結合前述兩者之長，進一步引介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概念替代建構主義，提出整合後的安全備戰模型；在第四部分，本文希望透過此模型的研究，回歸討論現實主義理論未來的發展與目標。

貳、何謂軍事擴散？

軍事擴散是一種過程（process），開始於新資訊的傳播，讓各國的菁英體認並決定接受新的技術，最後同化這些觀念進入該國軍事的制度與實踐中，其目的在於藉著加強軍事力量以重構國家間的權力關係。^②以其理論基礎觀之，軍事擴散其實就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③而針對此一過程，學界有著許多不同的解釋途徑：新現實主義者們認為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基於安全的需要，勢必將與其他國家產生權力衝突，為此新現實主義設計了競爭的軍事擴散模型；新制度主義者們則認為軍事擴散是世界各國透過國際制度互動的過程，亦即透過國際社會化進入世界秩序；還有從國內政治著手進行解釋者，他們認為企業家、政治菁英與軍方等利益相關者，透過宣導與動員以達成軍事擴散，以上這三種解釋可以歸納為理性主義（rationalism），以做為所謂反思主義（reflectionism）之對比。

註① 關於傳統軍事擴散的概念，可參見 Leslie Eliason and Emily Goldman, "Introduc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in Emily Goldman and Leslie Eliason eds.,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dea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2.

註② Emily O. Goldman,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military diffus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1 (2006), p. 69.

註③ 國際關係理論中對於社會化的分析甚為多元，並沒有一個公認的觀點。Atkinson 在探討國家軍事結構社會化上所運用的定義與本研究最為相符，他認為社會化有三個層次：首先是個體察覺到新的觀念，接著透過強迫、激勵或說服等機制，國家將新的觀念制度化，一旦形成了制度，這些新的觀念就會影響國際體系中其他國家的物質與理念結構。參見 Carol Atkinson, "Constructivist Implications of Material Power: Military Engagement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States, 1972-200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3 (September 2006), pp. 509~537.

另外，亦有從反思主義陣營中之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角度進行解釋，此學派大致可分為兩種觀點，前者認為當國際規範與國內規範有了共鳴（resonate）時，就會產生文化契合（cultural match），擴散也就因而出現，後者則認為國家感受到戰略挫敗，希望透過擴散藉以挽回頹勢，而擴散的程度則取決於文化的容忍力（cultural tolerance），當文化差異的容忍力越高時，擴散的速度與深度越快，兩者對於擴散的立論雖有歧異，但在建構主義的觀點裡，都可視為是所謂的軍事趨同性（military isomorphism）。④以下將先針對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進行梳理，以闡釋軍事擴散的內涵。

在理性主義方面，先有現實主義者 Waltz 將國家的平衡行為區分為外部與內部兩種，在內部平衡方面，他認為權力平衡會一再出現，同時國家也會仿效其他國家成功的政策並相互競爭，此即是所謂的爭勝（emulation）行為，⑤乃是一種社會化的機制。⑥透過平衡與爭勝，國家得以保有競爭優勢，亦增加了其生存的機率。Waltz 認為社會化的過程會限制以及塑造成員的行為，而構成員也會相互影響對方，但是作為自變數的構成員能力變化，只能帶來依變數的國家策略選擇，卻無法改變無政府狀態的結

註④ Joellen Pretorius, "The Security Imaginary: Explaining Military Isomorphism," *Security Dialogue*, Vol. 39, No. 1 (2008), pp. 99~100.

註⑤ 建構主義者們多用模仿（imitation）與仿效（mimic）兩種。Imitation 與 Emulation 在中文使用上往往都以「模仿」一詞翻譯，然而兩者實有其相異之處，根據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字義解釋，Emulation 是一種具「敵意」（rivalry）的行為，也是一種試圖追上，甚至超越對手（the endeavor to equal or surpass others）的行為，Imitation 是一種單純模仿（copy），或是一種透過學習而接納（The adoption, during a learning process）的行為，而 Mimic 則是等同於 imitation。此外，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更有更貼近其本意的解釋，亦即是「臨摹」（Imitation）與「爭勝」（Emulation）之異，理論上，爭勝是臨摹後的進一步行為，參見董崇選，「也談 text 及其相關的一些問題」，*中外文學*，第 14 卷第 6 期（1985 年），頁 161。甚至也有學者指出，Imitation 是一種受制（unfree）的行為，經由精確的觀察，亦步亦趨地模擬所見的模式，受被模仿的人或物無形的箝制，而無法區別它所模擬對象的真正內涵，而 Emulation 則是一種自由（free）的行為，能夠超越模擬，而形成一種具有自我發展的模式，甚至超越所模擬的對象，參見 Hans R. Jaus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 168。因此本文即借用文學上的名詞釋義，以模仿轉譯 Imitation，以爭勝轉譯 Emulation，以利釐清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相關概念。

註⑥ 建構主義者 Wendt 認為，他提出的文化選擇（Cultural Selection）等同於 Waltz 理論中的社會化，但他所稱的文化選擇是一種漸進的機制，是透過社會學習或模仿等類似的過程，將決定行為的因素在個人對個人，及世代對世代間傳遞，他同時強調文化選擇是直接通過行為者的認知、理性與意圖而運作，並不是無政府體系的壓力所致。Wendt 的模式著重於身分與利益的構築與再造，而理性主義模式則著重於在既定身分與利益基礎上的策略選擇，而他也認為這兩種模式並非互相排斥，兩個模式關注的是社會的不同面向。參見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7。不過，介於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文化現實主義者 Johnston，雖沒有以理性主義或是建構主義區分國家的行為，但他認為現實主義所稱的社會化只是一種選擇，並非建構主義中的內化，甚至不能視為是社會化，參見 Alastair I.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reface xv ; xxvii.

構。^⑦另外，他也強調國際社會化是一種自發、非正式以及無意圖的過程，透過這個過程，各國漸趨一致，同時由於競爭激烈，國家會進行模仿以爭勝，也因此達到了軍事擴散的效應。^⑧由 Waltz 的理論可以了解到，競爭是驅使國家進行軍事擴散的動力，換言之，爭勝即是現實主義者在分析軍事擴散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礎上，現實主義學派的 Elman 和 Taliaferro 等學者分別繼承並發展了相關的理論。

由於 Waltz 決心設計出一套簡約的系統理論，因此只集中於討論結構如何達成平衡。然而，新一代的現實主義者對於行為主體 (agent) 與結構的因素同樣重視，遂紛紛將研究焦點轉向國內政治的面向上。如 Elman 認為，各國擁有不同的天賦資源 (factor endowment)、地理環境，以及各不相等的威脅，自然會產出相異的軍事實踐，他以分析美蘇兩國的案例證明，在國家內部並非像 Waltz 的假設，亦即只會出現爭勝的策略，尚有抵銷 (offset) 與束手旁觀 (do nothing) 兩種可能。^⑨此外，Elman 以新現實主義的邏輯，結合組織模型 (organizational model) 形成了一種分析架構，以 2×2 的矩陣檢視國家是否能有效因應外在的戰略壓制，以及決策組織的偏好是否一致，進一步地對國家行為進行研究。^⑩而戴傑飛 (Jeffrey W. Taliaferro) 則提出了所謂的國家擷取資源模型 (resource-extraction model of the state)，該模型認為，在面臨外部威脅時 (他稱之為國家的外部脆弱性)，國家大致有三種策略，一為維持或逐步升級既有的戰略，二為爭勝，三為創新 (innovation)。^⑪無論是爭勝或是創新都需要重新配置資源，或是擷取更多社會中的資源，因此國家的權力能夠貫徹到何種程度，即是這

註⑦ 根據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爭勝乃是在無政府狀態下，構成員社會化以及權力競逐的產物，交互作用的結果又維持了無政府的體系，參見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3. Waltz 即認為社會化可以減少體系的分歧現象，促使體系中構成員藉由規範達成一致性的標準，亦即透過社會化能讓國家行為者進入體系的範圍，因為國家身處在無政府體系中，基於追求權力與生存的壓力，會盡力適應並接納體系的規範，參見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pp. 73-74.

註⑧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8.

註⑨ 抵銷是一國以其優勢對抗他國的軍事革新，袖手旁觀則是固守現狀，不做改變；而 Elman 也將爭勝做了等級上的區分，除了全面爭勝之外，亦有部分爭勝的兩種模式：改造 (reinvention) 與選擇性接納 (selective adoption)。參見 Colin Elman, "The Logic of Emulation: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pp. 42-45.

註⑩ 這裡的組織指的是一國內部的軍事組織 (通常為政府官僚，亦可能為特殊任務之編組)，此種組織在面對外部壓力時，會透過內部的權力運作與利益彙集，因而產生相對應的軍事實踐，此模型探討的重點在於組織內部如何偏好排序，以及授權 (empowerment) 與爭論 (contestation) 如何形成政策的過程。Ibid, pp. 79-92, 373-378.

註⑪ 戴傑飛為爭勝下的定義是：一種從大範圍以影響國家政軍制度的持續過程，並非單純的採用新型武器系統，或是在現有實踐下進行些許調整，或是在外來模型引導下斷斷續續地改革，又或是改變軍事準則而已，創新的定義則為一國有意識且具目的而創造全新的制度、技術以及治國實踐。參見 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July-September 2006), pp. 471-472.

些策略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⑫

上述現實主義者的觀點均偏重於權力面向的解釋，觀察到單一理論的解釋力不足，建構主義者 Farrell 因而結合了新現實主義、多元主義 (pluralism) 和社會制度主義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三者之長，提出了所謂的文化適應 (cultural adaptation) 理論來闡述世界文化 (world culture) ^⑬如何形塑軍事擴散，他認為軍事活動是在世界文化的社會結構下進行，而國際無政府狀態則提供各國動機在此結構中進行策略行爲，至於官僚與聯盟政治則調和了結構與策略行爲之間的落差，亦即，各國的軍事組織與運作必須合於世界文化所形成的模式，而他們的策略行爲也必須受世界文化的規範限制，當遇到外來的威脅時，^⑭各國可以透過國內的官僚或外國同盟 (也有可能是兩者並行) 來回應威脅，但回應的方式與力道還是取決於世界文化的約束，若是規範得到適當地確立，則該國會傾向於強化 (bolstering) 的行爲，反之，則會傾向於弛張 (stretching)。^⑮另一方面，Goldman 同樣體認到現實主義對軍事擴散的影響，他亦認為國家產生變革的趨動力是競爭，這與 Farrell 的看法相似，兩者皆認為國家競爭的心理與行爲不能存而不論，也代表著建構主義者試圖融合理性主義的部分觀點。然而，Goldman 在文化因素的認知上卻不同於 Farrell 的觀點，他主張國內政治文化才是促使政策改弦易轍的主因，在此理路中，菁英的態度即是關鍵，如果菁英在文化上的容忍度 (tolerance) 越高，則外在影響擴散的程度與廣度就越深，反之亦然。^⑯

註^⑫ 國家權力的程度可分爲：強制擷取社會資源，或是在與人民的約定下動員社會資源。若欲達成其目的則端賴於國家制度、國家推動的民族／國族主義，以及國家集權主義 (statism) 或反國家集權主義 (anti-statism) 的意識形態。參見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pp. 487-494.

註^⑬ 關於何謂世界文化，Farrell 並沒有給一個完整的定義，從其文章脈絡可以得知，世界文化的規範是反映了西方的傳統與實踐，因為大多數專業與組織的領域都源自於西方，但他同時也強調系統規範會促進一國在跨國網絡上的合法性，而該國的組織與行動也必須符合由跨國網絡所建立的規範，也就是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e) 的建構過程。參見 Theo Farrell, "World Culture and Military Power,"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3 (July-September 2005), p. 456. 本研究則認為 Farrell 所謂的世界文化，仍不免脫離西方中心論的窠臼。誠然，西方 (特別是美國) 引導了現代主要的軍事發展，但卻不能忽略其他文化的影響，如在冷戰時期，蘇聯亦培養出迥異於西方的軍事文化，影響了共產集團成員與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軍事組織與準則，甚至蘇聯研擬的軍事科技革命 (Military Technical Revolution, MTR) 更被視爲是觸發美國軍事事務革命的動力，因此，使用世界文化的途徑來理解世界的軍事擴散似乎較不適當。參見 Michael J. Eisenstadt and Kenneth M. Pollack, "Armies of Snow and Armies of Sand: The Impact o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on Arab Militaries," in Emily Goldman and Leslie Eliason eds.,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dea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63-92.

註^⑭ 這裡的威脅指的是對該國合法性 (legitimacy) 的可能傷害，此爲社會制度主義的概念，與新現實主義強調的安全、多元主義強調的自利 (self-gain) 等概念有別，參見 Farrell, "World Culture and Military Power," p. 453.

註^⑮ Farrell, "World Culture and Military Power," pp. 456-461. Farrell 並以兩個案例來解釋上述這兩種現象，分別是：愛爾蘭 (Irish) 軍隊組織在二戰中的變革，說明規範強化的狀況，以及北約 (NATO) 在科索沃 (Kosovo) 戰爭中的空襲行動，說明規範弛張的狀況。

註^⑯ Emily O. Goldman,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military diffus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2006), pp. 70, 75.

總的來說，無論是理性主義或是建構主義都有理論上的缺失，大致可分為下列兩點。首先是雙方壁壘分明的理論鴻溝：對於文化因素的認知。理性主義陣營中的現實主義者無論新舊均反對建構主義的文化決定論（cultural determinism），即是以文化的角度觀察並分析所有的現象，或是承認文化確有其影響，但應屬於剩餘變數（residual variable），缺乏可操作性，因而省去不論。^①相較之下，建構主義者雖強調了文化在研究上的必要性，卻也將國內的決策過程完全置於文化的論述下，忽略了形塑政策中的理性（或說有限理性）特徵，決策不只是會受到文化影響，更會受到利益及偏好的排序所左右，因為國家在決定某一行為時，其決策考慮不會是純粹適當性邏輯的思維，也不會是純粹後果性邏輯的思維，必定是兩個邏輯以複雜的形式前後（或同時）進入決策的認知過程中。

其次，新一代的現實主義者及建構主義者，都注意到了國內政治對軍事擴散的影響，但無論是現實主義者將國家權力或官僚組織、建構主義者將文化視為是中介變數加以操作，都可以觀察到他們對於國內政策過程（policy process）的認識不足，亦即，他們對於國內決策如何產生的認知是粗糙的。這是由於結構現實主義是設計用來解釋國際結構的宏觀理論，對於外交決策等涉及微觀行為者的部分不甚重視，亦影響了現實主義發展的道路；而建構主義則是為了解釋結構與行為主體的互動，對國內政治亦著墨不多。換言之，軍事擴散是一種討論國家政策產出的理論，而架構此種理論的學者卻往往屬於國際關係學門，他們雖注意到了國內政策過程形成的重要，卻缺乏處理這部分的能力，在在顯示政治學各學門之間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必要性。

參、理論綜合下的安全備戰模型

近年來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蓬勃發展，在研究方法上不僅結合了國際與國內兩層次的分析，更承認了文化在國家回應系統情勢時的影響力，而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普遍也認為，最終仍是體系的壓力使得一國的戰略出現調整，甚至改變其文化。^②本研究正是立足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思維上：來自國際體系成員的外部驅力（自變數），包括了相對權力的物質變化，以及（潛在）對手國的認知，必須透過國內

註① 戴傑飛雖在國家權力（中介變數）中論及意識形態，但他將意識形態的範圍侷限在國家集權主義或反國家集權主義的對抗中，並沒有再論及意識形態的文化層面。須注意的是，意識形態曾被一些政治學家當作是政治文化，認為政治文化是生活方式（及物質）與意識形態的總體表現，參見 William T. Bluhm, *Ideologies and Attitudes: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4)；Richard Wilson, *Compliance Ideologies: Rethinking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註②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20.

政治（中介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而浮現，^{①⑨}國內政治的運作即是所謂的政策決策過程，影響此過程的可能有決策菁英群，以及專職官僚群，他們會將偏好排序，列出可能的選項以進行選擇，依靠的是有限理性以權衡利害得失，因此這裡是以後果性邏輯操控。^{②⑩}但這些人在做出決策的過程中，會受到該國政治文化（干擾變數，moderating variable）的影響而形塑政策，^{②⑪}甚至重新進行決策，這裡即是以適當性邏輯操控，而軍事擴散的政策產出（依變數）可分為三種：爭勝、創新與維持現狀，即為國家將採取的戰略類型，亦可視為是國家面對外在威脅時所產生反應的強度變化（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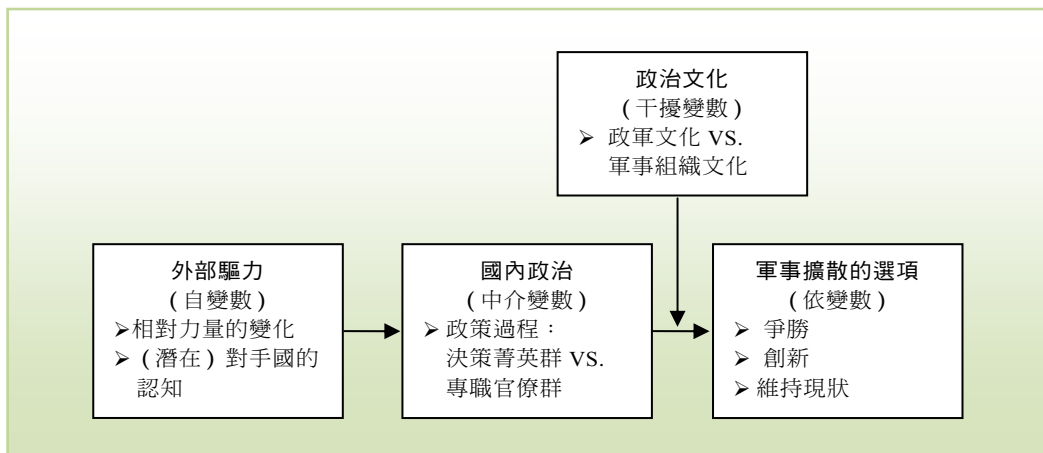


圖1 安全備戰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註^{①⑨} 中介變數係指介於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會對研究結果產生作用的變數。中介變數要等自變數發生後才能量測到（或觀察），而依變數也要等中介變數產生後才能量測到，此即所謂的中介效果。參見 R. M. Baron and David A. Kenny,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1, No. 6 (1986), p. 1176.

註^{②⑩} 特別要指出的是，國家軍事組織是一種相對穩定，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劇烈變化的系統，而導致改變的最重要因素乃是有限理性的作用，它能加強或減弱打破既有利益的思維，如果菁英與組織的有限理性傾向於現存的文化，則會形成一個保守的政治系統，但由於文化從形成到確立，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因此即便菁英與組織想要改變，通常也需要長期的努力才能跨入新的文化，而這最終還是得依靠理性的作為。參見 Jeffrey W. Legro, "Culture and Preferen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wo-Ste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March 1996), p. 127.

註^{②⑪} 干擾變數是在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會產生很大影響的變數，可視為第二（獨立）自變數（a second independent variable）。一般而言，可歸類為自變數者，其對依變數的影響比較大且直接，而列為干擾變數者，對於依變數的影響是比較小而間接。參見 R. M. Baron and David A. Kenny,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1, No. 6 (1986), p. 1174.

來自外部的驅力是自變數，包括了相對力量的變化與（潛在）對手國的認知兩方面。當一國檢視其安全環境以決定哪些國家對己構成威脅時，首先關注的必然是對手國（無論是潛在或是宿敵）的實力，其次，必須設法探知對手國的意圖，唯有將對手國的實力與意圖連結起來，才是真正的理解了自身的安全，否則即會陷入安全困境。^②就前者而言，國與國之間相對力量的變化包含了個別國家的綜合能力與進攻能力，^③綜合能力是一國總體資源力量的評估，大致可分為人力與物力兩類，但這些力量必須是最終可以轉換為實際的數據，甚至必須與進攻能力做一連結加以計算；而進攻能力則是指一國作戰與獲勝的評估，涵括了質量與數量兩方面的總合，因此，各國不僅要計算對手國資源的長期變化，更要評估這些資源在短期內能夠被動員來發動戰爭的程度。^④除了對手國的估算之外，還應考慮對手國勢力範圍或具有影響力的地區內中小型國家的力量，因為這些國家也許可以提供兩方緩衝的空間以及個別國家的支援。^⑤

就後者而言，（潛在）對手國的認知大致可分為兩個面向：第一，對手國會依照本身的利益去界定他國是有利於己（朋友）或是有害於己（敵人），而這種界定通常不是客觀的，且會依該國利益所在隨時變更；第二，對手國對於確定他國的意圖有幾分把握，這種確定即是該國的信念（belief），可藉由觀察該國的領導人而探知。^⑥一般而言，他國的實力若是上升，而意圖又是不利於己，可視為是一種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的傾向，這種國家會追求權力極大化（power-maximizing），往往是威脅與不穩定的來源，反之，縱使他國實力上升，卻無不利於己的意圖，則屬於一種維持現狀（status-quo）的傾向，這種國家追求的是安全極大化（security-maximizing），並不容易挑釁或是輕啟戰端。^⑦

為了解釋國家可能採取的戰略類型和強度的變化，必須說明外部驅力如何通過一個單元層次的中介變數（即國內政治）而進行滲透，政府最終決策及嗣後的國家行為，實為相關決策者間彼此相互議價及妥協後的結果。而此最終政策的產出，亦非全然為決策團隊中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或是部門彼此提案中優勝劣敗的單純表現。取而代之的，更是代表部門及個人利益的決策參與者間，經過意見衝突及利益得失評估

註② 舉例來說，北韓與英國同樣擁有核武，但兩者對於美國的意義則全然不同，這即是對手國的不同意圖使然，如果完全不考慮意圖，那麼英國跟美國之間將會出現安全困境，而這顯然與現實狀況不符，顯見純粹從實力著眼的現實主義必須修正，參見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78.

註③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3.

註④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5~26.

註⑤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9~20.

註⑥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1989), p. 82.

註⑦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4~25.

後所達成的折衷協議。²⁸分析的對象則是政策決策過程中的參與者，在本研究可分為兩類：一為決策菁英群，這裡是指最高決策階層與其幕僚、顧問、特定官僚所組織成的決策小組，乃至於國會議員等。如果政府領導人要制定一項新政策，而原本負責的特定小組又力有未逮，領導人就有可能另起爐灶，以另一小組取代之。另一則為專職官僚群，這裡是指負責所有軍事相關業務的常任官員。他們實際上管理著國家的軍事組織與建設，遠比決策菁英更為熟稔軍事政策。²⁹當一國的（潛在）對手國的力量增強之時，專職官僚群會先於決策菁英群探知這種變化，並試圖了解（潛在）對手國是否對己具有敵意。在這段期間，專職官僚群通常會開始設法研擬對策，以提供決策菁英群做為決策參考。但須注意的是，決策菁英群不一定會對於專職官僚群的建議照單全收，這可能有兩種原因：首先是對外政策上的考量，決策菁英群除了國家的軍事政策外，尚須衡顧其他方面的政策，在與外國的往來上，自不限於軍事方面的考量，亦包括了外交、經濟等面向，因此對於（潛在）對手國的策略必定得要多方著手，不若專職官僚群僅聚焦於軍事方面，故在做出決策上越形困難，也更難以捉摸。

其次，為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在政策的偏好與利益的排序上，兩者由於組成分子不同，前者是經民選（或繼承、指定）執政，在人類史上除了極少數的極權統治外，無論是民主或專制政體，民意都是其權力的來源，決策菁英群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回應民意。然而，專職官僚群大多基於憲法保障，擁有一定的任期與俸祿，因此在決策上，或基於其專業，或基於其單位利益進行籌畫，較少注意（也不必然需要考慮）民意的需求。故兩者雖同是以國家安全的後果性邏輯驅動，卻因兩者位置的不同，有時會在決策中發生拮据不入的情形，需要透過政治溝通以達成施政的一致性。換言之，在政策決策過程中，決策菁英與專職官僚群之間會爭奪掌控政策的主導權，兩方都希望讓自身的利益變成政策，這種體制壓力唯有以協商才能做成政策選項。³⁰

此外，在政策過程當中，個體或組織的行動策略，不可避免的會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運用政治文化輔以解釋政策的偏好，可以糾正單純使用理性選擇的謬誤。³¹由於長期在專業領域中進行運作，官僚組織本身及其內部人員皆對職司領域，有著一套不同其他部門的特殊信念，此一信念係由該組織於專長領域中的認知及經驗建構而成。

註²⁸ Graham T.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AW Longman, 1999), pp. 255~257.

註²⁹ 此外，在政策過程中，可能還包括了利益團體參與運作，但由於利益團體的效用大多是在民主發展成熟的國家（特別是西方民主國家）方能顯現，在極權、威權主義，或是民主制度尚未成熟的國家，利益團體的功能並不明顯，甚至無法形成。本研究的模型為求普遍性，故在國內政治的變數上刪去了利益團體，而假設一國社會中各種利益的匯集與競爭，會透過官僚或相關政府組織反映出來。參見張小勁、丁韶彬、李姿姿譯，Rod Hague and Martin Harrop 著，*比較政府與政治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年），頁260~263。

註³⁰ William W. Newmann, *Managing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ocess*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3), pp. 1~6.

註³¹ 彭勃、邵春霞譯，Christopher Hood 著，*國家的藝術：文化、修辭與公共管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999。

透過此一文化的內化過程，該組織及其成員在處理相關議題時所展現出來的態度，皆會強烈圍繞在支持組織信念與維護組織利益的立場上，^㉓這也將影響個體或組織策略，進而指引其行動。

因而，在本研究中，政治文化被視為是一種干擾變數，它具有調節的效果，亦可視為是另一自變數。^㉔對於分析國家行為而言，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與文化主義擁有相似的概念，它們都屬於方法論上的整體主義（holism），重視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文化與規範，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它們源自於不同的學科：建構主義起於國際關係，而文化主義起於比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這就決定了它們在分析層次上的不同，前者重視國際結構與國家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後者則強調各個國家行為者（包含其國內各層次）之間的互動。從本質而言，這即涉及了以文化做為研究本體（或變數）的概念界定，其載體（carrier）可分為歷時性（diachronic）：以縱向貫穿、長時程歷史連續性的建構主義取向，以及共時性（synchronic）：以橫向散布、短時程共同結構的文化主義取向，^㉕本文所提出的模型著重於特定時期國家遭遇到外部的變化，因而產生政策以適應之，故傾向於共時性的文化主義。

在文化的內涵上，本文認為國家軍事行為受到決策菁英群與專職官僚群個別的兩種集體信念影響，前者即是政軍文化，^㉖而後者則是所謂的軍事組織文化。^㉗須注意的是，特定的文化因素對於政策的決策過程、政策行動者及系統環境的形塑，都可能產生影響。由此觀之，政軍文化與軍事組織文化或有重疊，卻亦有對立之處，例如受甄拔而進入決策菁英群的將領，其思維本來屬於軍事組織文化，但卻因為位置改變，亦必須做出調整，以適應符合決策菁英群的政軍文化，這往往會出現扞格不入之處，而

註㉓ Allison and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p. 167~168.

註㉔ 政治文化作為一種自變數，乃是一套內化於人們心中，如同一般常識的隱然邏輯關係，找出這種內部邏輯，就可以確認並概念化文化變數。參見 Min-hua Huang, "How Can Political Culture Be a Useful Independent Variabl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 No. 1 (June 2004), pp. 147~191.

註㉕ 徐斯勤，「國際關係中的文化因素 VS. 物質因素－以冷戰前後日本與南韓的安全關係為例」，石之瑜主編，*政治文化研究的現狀與開展*（臺北市：翰蘆圖書，2007年），頁91。

註㉖ 政軍文化（political-military culture）是一種影響國家特定成員如何看待國家安全的文化，特別是在國家軍事力量的使用上，相對於 Johnston 所論述之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偏重於決策者的認知因素，Berger 的政軍文化除了對自我的認同、與聯盟的關係，及自身力量結構外，更涵括了軍文關係，其應用較為廣闊，不似戰略文化過於縮減了現實政治中潛在的因果機制。參見 Thomas U. Berger,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4~16.

註㉗ 軍事組織文化是一種關於戰事的集體認同，包含了軍人們對自己的定位、對世界的看法、擬訂軍事計畫、對領導者的建議以及行動準則等等，此種文化的產生與一國的歷史經驗、地理位置及政治文化有關，再由核心領導階層反覆灌輸而獲得穩固，可促進群體團結並有效動員。參見 Jeffrey W. Legro,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 Jeffrey W. Legro, "Military culture and inadvertent escalation in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Spring 1994), p. 112.

使得政治過程產生更多摩擦。³⁷基本上，如同決策菁英群與專職官僚群的互動，兩方理應基於國家利益而從事其行為，相對應而生的文化亦復如此，但實際上，文化因素與政策形成過程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容易掌握，因為在結構與行動體系的層面上，文化固然會與政策決策產生互動，但潛藏性的文化影響機制更可能鑲嵌在制度系統的形成過程之中，如軍事組織文化雖是一國軍事組織中官僚互動的因素，卻也可能包含著該國軍事組織建立以來，歷任軍事首長甚或是國家領導人戰略思想的遺產，這會形成一種潛在的文化，制約著軍事組織的文化發展。³⁸

準此，當一國察覺（潛在）對手國的實力開始提升，也探知了其確有敵意之際，該國的決策菁英群與專職官僚群理論上應會針對此種情勢，逐步研擬對策。而各種政治文化（政軍文化與軍事組織文化），也會在這過程中發揮作用，亦即，決策菁英群與專職官僚群不但會憑藉著理性來彼此協調、互相交涉，也會受其文化背景所左右，牽動著決策中的任一環節。當理性判斷（中介變數）與文化信念（干擾變數）發生衝突時，不僅將使政治過程暫時脫離常軌，決策菁英群可能以政治手段迫使專職官僚群接受其安排，專職官僚群亦可能以大規模力量反制決策菁英群，而使得其規畫勝出（但這屬於權力上的適應，並不會就此輕易地改變了兩群之間文化上的對立），另外也將使政策產出（依變數）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如一國的政治文化明顯對於另一國充滿了敵意，儘管兩國的實力雖未發生太大變化，卻也有可能加強對於該國的軍事能力；又一國的政治文化可能偏向於以扈從（bandwagon）為主，則（潛在）對手國雖不斷加強能力，但該國可能仍無所作爲，或僅做出一些小幅度的改變。

最後，就安全備戰模型產出的政策而言，主要有維持現狀、爭勝與創新三種。³⁹維持現狀是一種平衡不足（underbalancing）的現象，意指國家在回應危險的侵略者時，本應努力去嚇阻或反擊，但總有些時候表現出來的行為是不去平衡或是無法有效平衡，故出現了維持現狀的弔詭情形，而這是由於國內政治的因素所致。⁴⁰爭勝與創新的定義與前述戴傑飛模型相似，不再贅述。需延伸論述的是，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以光譜（spectrum）的角度視之：由左至右分別是國家採取策略風險的大至小，風險最大

註³⁷ Theo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1 (2002), pp. 49~56.

註³⁸ 一般而言，軍事組織文化的影響力需要靠其他單元傳達，如決策過程的結構、國內權力分布的狀況，或是範圍更為廣闊的政治文化，即是具有遠見領導人的戰略文化，參見 Elizabeth Kier, *Imagining War: 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註³⁹ 本文認為現實主義的爭勝在解釋力上更勝建構主義的仿效，仿效是針對群體的模仿行為，而爭勝是針對成功者的模仿行為，兩者雖都是為了生存，但仿效是為了融入群體，是一種對於安全的回應，爭勝則是為了日後的勝利，是一種對於壓力的回應，如 Johnston 可以用仿效解釋中國何以參與聯合國裁軍會議（Conference Disarmament），或是中國遵守軍控規範，進而制度化其行為的過程，但卻無法用仿效解釋中國連年擴張的軍費與軍備，故本文並不認為在軍事擴散上會出現單純的仿效行為，因此在安全備戰模型中使用了爭勝的概念。

註⁴⁰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 p. 168.

者為創新，風險最小者為維持現狀，而爭勝則是居於其中。舉例來說，若是兩國在一項戰略技術上展開競爭，在競爭趨烈的情況下，落後的國家會傾向風險規避，先透過模仿以得到立即而確定的收益，再伺機超越，亦即採取爭勝，而非透過創新來獲取優勢。此外，即便在競爭趨緩的情況下，一旦選擇創新的風險增加，國家很有可能也會傾向風險規避，轉向爭勝的政策。環顧歷史，不只是次級國家會選擇爭勝，主要強權往往也會權衡本身的弱項，以爭勝取代創新，企圖在某些層面上保持既定的優勢，讓對手國無法超越。^④

肆、結論：現實主義的未來

結構現實主義在預測冷戰失敗後，又遭逢建構主義學派的興起，雙重的打擊使得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一度失去其光彩。所幸，有一群年輕的學者不斷的努力，既承繼了自 Morgenthau 以降，已為人所淡忘的古典現實主義，又銜接了 Waltz 盛極一時的結構現實主義，結合體系與單元兩層次的分析，形成了二元認識論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儘管在過程中遭遇到許多挑戰：有質疑還原主義的研究方法違背華爾滋研究綱領，有批評新古典現實主義吸收了太多其他學派的思路，這些會讓現實主義不再是現實主義。事實上，理論綜合 (theory synthesis) 已經是未來研究不可規避之路，方法論上的多元主義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更是研究者必須認真以對的發展，傳統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建構主義，都只是以一種理型 (idea type) 的思維在觀察這個世界，各方各據一角，以自身設定的框架進行解釋，如此方便了研究，卻落得各說各話的局面，對學科的進步並無實益。

本研究中提出的安全備戰模型是基於理性主義的理念，再輔以文化主義的思路，企圖構成一個對真實世界較為完整的觀察。平實而論，本模型中的每一個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都極難掌握，變數本身也難以操作和測量，特別是國內政治上的群體之間互動，不只涉及了資料的隱密性，更因為單元層次的分析極易與其他次單元層次參雜，除此之外，理性與文化之間的糾結也常使得研究者迷失其中，凸顯了社會科學的獨特性與無奈。安全備戰模型即是希望在現實主義 (或說 Waltz) 的研究綱領中，扮演一個正面啟發 (positive heuristic) 的角色，以補充做為保護帶 (protective belt) 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在 Waltz 研究綱領邁入退化階段的當下，做為新一代研究綱領候選者的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否足以取代，是未來值得觀察與可供嘗試的方向。

* * *

(收件：98年11月16日，接受：99年5月18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④ João Resende-Santos, *Neorealism, states, and the modern mass ar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1-75.

Secure-Arming Model under Complex Logic

Lucian, T. H. Hsu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models of external balancing based on neo-realism. Nevertheless, not all can interpret why and how states choose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al balancing strategies to response the extrinsic stress.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a state's military policy,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grates the system-level and unit-level variables. However, it still ignores the dual nature of the logic of state's action, namely, besides interest,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Hence, a new "secure arming" model combining r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nd culturalism) is warranted to support the military diffusion theories.

Keywords: Military Diffusion, Secure-Arming Model, Neoclassical realism,
Socialization, Theory synthesis

參考文獻

- 徐斯勤，「國際關係中的文化因素 VS.物質因素－以冷戰前後日本與南韓的安全關係為例」，石之瑜主編，*政治文化研究的現狀與開展*（臺北市：翰蘆圖書，2007 年），頁 85~122。
- 張小勁、丁韶彬、李姿姿譯，Rod Hague 與 Martin Harrop 著，*比較政府與政治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 年）。
- 彭勃、邵春霞譯，Christopher Hood 著，*國家的藝術：文化、修辭與公共管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999。
- 董崇選，「也談 text 及其相關的一些問題」，*中外文學*，第 14 卷第 6 期（1985 年），頁 160~168。
- Allison, Graham T.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AW Longman, 1999).
- Atkinson, Carol, "Constructivist Implications of Material Power: Military Engagement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States, 1972-200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3 (September 2006), pp. 509~537.
- Baron, R. M. and David A. Kenny,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1, No. 6 (1986), pp. 1173~1182.
- Berger, Thomas U.,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luhm, William T., *Ideologies and Attitudes: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4).
-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Buzan, Barry,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3.
- Copeland, Dale C.,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 Dueck, Colin,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Eisenstadt, Michael J. and Kenneth M. Pollack, "Armies of Snow and Armies of Sand: The Impact o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on Arab Militaries," in Emily Goldman and Leslie Eliason eds.,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dea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63~92.
- Eliason, Leslie and Emily Goldman, "Introduc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in Emily Goldman and Leslie Eliason eds.,

-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dea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0.
- Elman, Colin, "The Logic of Emulation: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 Farrell, Theo,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1 (2002), pp. 49~72.
- _____, "World Culture and Military Power,"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3 (July-September 2005), pp. 448~488.
- Goldman, Emily O.,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military diffus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1 (January 2006), pp. 69~91.
- Huang, Min-hua, "How Can Political Culture Be a Useful Independent Variabl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 No. 1 (June 2004), pp. 147~191.
- Jauss, Hans R.,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Jervis, Robert,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Johnston, Alastair I.,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Kier, Elizabeth, *Imagining War: 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Layne, Christopher,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egro, Jeffrey W., "Culture and Preferen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wo-Ste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March 1996), pp. 118~137.
- _____, "Military culture and inadvertent escalation in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Spring 1994), pp. 108~142.
- _____,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Newmann, William W., *Managing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ocess*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3).
- Pretorius, Joelen, "The Security Imaginary: Explaining Military Isomorphism," *Security Dialogue*, Vol. 39, No. 1 (2008), pp. 99~120.
- Resende-Santos, João, *Neorealism, states, and the modern mass ar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chweller, Randall L.,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_____,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
- Simmons, Beth A., Frank Dobbin, and Geoffrey Garrett, "Introduction: the diffusion of liberalization," in Beth A. Simmons, Frank Dobbin, and Geoffrey Garrett eds.,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arkets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63.
- Snyder, Jack,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Taliaferro, Jeffrey W.,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July-September 2006), pp. 464-495.
-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 Wendt, Alexander,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71-81.
- _____,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ilson, Richard, *Compliance Ideologies: Rethinking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